

## 作者序

本書正文六章，源自筆者於 2018 年 11 月及 2019 年 5 月，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舉辦的「政大華人文化講座」作出之系列演講。演講主題為「現象學與文化交互理解的實踐」，演講內容則主要依據筆者 2016 年以英文出版的現象與跨文化理解的專著 *Phenomenology and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Toward a New Cultural Flesh* 一書的六個相關篇章，<sup>1</sup> 在漢語文化脈絡下改寫而成。每一章的講稿都經加工、補充與修訂。部分篇章補上了一些英文版未及的材料。〈導言〉篇則專為本書撰寫。

筆者首先衷心感謝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任林遠澤教授的邀請，讓筆者有機會以中文講述這一系列原先以英文寫成的文章，並藉此與政大哲學系同寅和其他聽講者作愉快而深入的交流。把文章由英文改寫成中文的過程，處理的不僅僅是詞彙的翻譯問題；由於要面對漢語文化世界的讀者群，這工作本身就是哲學上跨文化理解的挑戰。

---

<sup>1</sup> Kwok-ying Lau, *Phenomenology and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Toward a New Cultural Flesh*, series “Contributions to Phenomenology” (Dordrecht: Springer, 2016), Ch. 3-8.

筆者也多謝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接納出版是書，同時十分感謝中心的行政團隊在演講期間的各種細緻安排，以及在出版事宜上的協助。是書原預計於 2020 年中出版，但由於 2019 年中開始香港局面突然急劇變化，加上 2020 年春開始的全球性新冠病毒來襲，令書稿之修訂及出版事宜受阻，筆者深表歉意。

本書是筆者二十多年來，透過現象學方法思考文化交互理解各種課題的部分成果。希望拙作能在這一領域，收拋磚引玉之效。



2022 年 4 月 5 日於香港

## 第1章

# 導言：現象學與文化交互理解的實踐

本書的一系列文章將從現象學角度從事跨文化哲學的探索。原籍德國的現象學之父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沒有對任何東方哲學作過依於文本的內部討論，甚至曾經說過印度哲學和中國哲學都並非真正意義下的哲學，顯示了他持守著一個歐洲中心論的哲學觀。然而，當胡塞爾在從事各種具體現象學研究之際，他展示了一種開放的探討態度和嚴謹的研究方法，在德國內外鼓舞了幾代的追隨者，把現象學發展成一個跨語言、跨文化，和跨學科的學術運動。本系列文章，就是一方面嘗試運用現象學運動中幾位重要哲學家——胡塞爾之外，還有法國的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和捷克的柏托什卡（Jan Patočka, 1907-1977）——提供的一些理論資源，重新理解中國道家哲學、儒家哲學，以及印度佛家哲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學說和方法論議題；另一方面，則透過當代中國哲學的一些重要概念創新，即勞思光的「引導性哲學」和「自我轉化」概念，釐清當代西方哲學中的一種新發展趨向——倫理學轉向。這一雙向的閱讀和思考，體現的是哲學上文化交互理解的實踐，透過培育一種新的文化肌膚，<sup>1</sup>具體地勾畫出

---

<sup>1</sup> 「文化肌膚」（cultural flesh）是筆者在晚期梅洛龐蒂「肌膚存在」（la chair,

一條朝向建立跨文化現象學的道路。

### 1.1 為什麼要從事哲學上的文化交互理解？

在當代世界這一文化多元的處境之下，從事哲學上的文化交互理解之首要目的，當然是促進不同文化之間在哲學層面的溝通。然而，同樣重要的是，要避免完全活在單一文化系統之內的哲學所造成的封閉性。成熟期的勞思光在這問題上有很好的說明。

在〈對於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之探討及建議〉一文中，勞思光的首要目的是向西方哲學界提出他理解的傳統中國哲學之特質，以方便源自中國和西方兩種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溝通。<sup>2</sup>這已是有意識地從事哲學領域上的跨文化理解。但這工作應如何進行？勞氏提出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必先抱著哲學作為開放思維的態度，並在

---

flesh) 概念的基礎上塑造的新概念，它指某種精神狀態和肉身的部署，讓我們的肌膚提升對其他文化的文化敏感度，能夠分享其他文化的文化觸覺，從而進入其他文化那個在客觀科學底層的文化世界，感受到其他文化裡人們的心靈跳動，打開一條具體的文化交互理解之路。請參劉國英：〈肌膚存在：從存在論層面到跨文化層面的運用〉，《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第6期，2016，頁75-108；〈文化肌膚與文化交互理解的現象學：理論與實踐〉，《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9卷，第2期，2019，頁139-162；〈從肌膚存在到文化肌膚：走向文化交互理解的現象學〉，《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第9期，2020，頁91-128。

<sup>2</sup> 勞思光：〈對於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之探討及建議〉，《思辯錄》（台北：東大圖書，1996），頁3-37，此處頁18；本文有英文版：LAO Sze-Kwang, "On Understanding Chinese Philosophy: An Inquiry and a Proposal", in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ind: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ed. Robert E. Allinson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65-293.

這基礎上提出一個「對哲學的開放概念」。<sup>3</sup>作為一個對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源自印度的佛家哲學都有深入研究的當代中國哲學家，勞思光了解到中、西、印這三大哲學傳統發展出來的不同哲學理論，都各有其建樹和重要性。這些不同哲學理論之有建樹，在於它們都不是泛泛而談之說，而是各就一組重要的、確定的、因而是殊別的哲學議題，確立某些重要的思考原則和方法，甚至建立了理論典範。特別成功的哲學理論，會表現成不同程度的完滿的哲學系統。然而，建立這些成功的殊別哲學理論以至哲學系統需要付出代價，就是表現成一個個的封閉系統，這在在展現出它們持守的哲學概念，是一種「封閉性哲學概念」。<sup>4</sup>它們的封閉性在於：作為哲學理論它們只適用於處理某些特定的、殊別的哲學理論問題。而放眼於中國、西方和印度三大哲學傳統的歷史發展，後出的、具體的哲學問題不斷被提出，然而並無任何單一哲學理論——儘管它的系統性極強，例如康德和黑格爾各自宏大的哲學體系——可以自稱或被公認為終極的哲學理論。<sup>5</sup>故此，即使要在理解一個單一哲學傳統的內部歷史演變，已經不能停留在一個封閉的哲學概念，而需要一個開放的哲學概念。當面對哲學層面的跨文化溝通之時，我們更需要一個開放的哲學概念，以幫助哲學工作者由某一個殊別的文化傳

---

3 勞思光：〈對於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之探討及建議〉，《思辯錄》，頁18。

4 勞思光：〈對於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之探討及建議〉，《思辯錄》，頁16。

5 勞思光指出，康德哲學系統也難逃封閉性的命運：「當康德宣稱要『完整而有系統地展示理解使用之一切超驗原則』的時候，他的系統很清楚地封閉了。」〈對於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之探討及建議〉，《思辯錄》，頁14，註8。而當晚期維根斯坦把哲學的功能定為一種治療性的訓練，排斥了哲學思考的所有其他功能，則這一哲學概念雖然有異於西方傳統的哲學概念，卻仍是一個封閉的哲學概念。同上文，頁14。

統，進入另一個文化傳統，以達至有哲學深度的文化交互理解。

勞思光在西方的「認知性哲學」(cognitive philosophy)的基礎上提出中國的「引導性哲學」(orientative philosophy)概念，<sup>6</sup>此舉並不是要重新肯定以至頌揚中國哲學的某些封閉性特質，而是要指出，任何源自單一文化世界的哲學傳統，都有其封閉性。要認識到一己文化傳統下的哲學的封閉性在哪裡，其中一個必要的步驟，就是要認識另一文化傳統下的哲學，與一己文化傳統下的哲學的某些基本差異，特別是在哲學功能上的差異。而認識不同文化傳統下的哲學理論之間的差異，就是建立跨文化哲學觀的第一步。勞思光是在這一基礎上提出他的引導性哲學和認知性哲學二分的中西文化對舉的哲學觀，並在這引導性哲學與認知性哲學的區分之基礎上，具體地展示一種開放的哲學概念。這一開放的哲學概念讓我們理解到，引導性為主的中國哲學傳統與認知性為主的西方哲學傳統各自發揮不同的哲學功能（引導性功能和認知性功能），處理不同性質的哲學問題。這兩種功能之間沒有高低之分，因此不能根據它們之間的差異而對這兩個不同的哲學傳統作出一高一低的價值判斷。

借助勞思光提出的引導性哲學概念，我們將發現，以認知性哲學為主的西方傳統哲學，原來在古希羅時期已曾經產生引導性哲學。不單如此，我們還將發現，當代西方哲學界中有極大成就的胡塞爾和晚期的傅柯，都認為真正的哲學有引導性功能，他們實質上都擁抱引導性哲學的概念（參本書第7章）。

---

<sup>6</sup> 勞思光：〈對於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之探討及建議〉，《思辯錄》，頁18。